上海文学通史下册目录

第三编摇上海现代文学史

导语 …… 远藏
第十二章摇全国文学中心的南移与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
中心地位的确立 …… 远元
摇第一节摇上海市民文学基地的形成及对于现代文学
基地的召唤 …… 远元
摇第二节摇新文化力量在上海的汇集 …… 远怨
摇第三节摇《小说月报》及其改版 …… 远藏
摇第四节摇《创造季刊》的争锋 …… 远元
摇第五节摇文学社团与文学流派对上海的覆盖 …… 远苑
第十三章摇写实主义文潮 …… 远藏
摇第一节摇文学研究会的社团操作与上海 …… 远藏
摇第二节摇“血与泪”的写作 …… 远怨
摇第三节摇乡土文学 在上海写出乡下的“胸臆” …… 远元
摇第四节摇叶绍钧的灰色人生表现与上海周边地区生活 …… 远园
第十四章摇浪漫主义异帜 …… 远源
摇第一节摇创造社的反抗与跻身上海 …… 远元
摇第二节摇郁达夫、郭沫若 有识无产者的自叙传 …… 远员
摇第三节摇浅草社与沉钟社的创作 …… 远苑
摇第四节摇弥洒社与湖畔诗社的创作 …… 远员
摇第五节摇活跃在上海的戏剧文学社团 …… 远源
第十五章摇现代主义端绪 …… 远怨
摇第一节摇李金发、冯乃超、穆木天 象征主义的初现 …… 远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摇第二节摇《琼斯王》模式与洪深的探索 …… 这苑
摇第三节摇《莎乐美》、《恶之花》模式与唯美主义创作 …… 这园
第十六章摇上海——多重对垒交织中的焦点 …… 这源
摇第一节摇文学与革命的双重可能 …… 这苑
摇第二节摇太阳社、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倡导…… 这园
摇第三节摇革命文学论争中的偏颇 …… 这苑
摇第四节摇“左联”的成立及其斗争 …… 苑园
摇第五节摇两个口号之争 …… 苑园
第十七章摇普罗文学创作 …… 苑愿
摇第一节摇“反抗去”和革命的罗曼蒂克 …… 苑愿
摇第二节摇柔石、丁玲、张天翼的创作 …… 苑园
摇第三节摇茅盾和社会分析文学 …… 苑怨
摇第四节摇萧军、萧红、沙汀、艾芜、叶紫等的流亡文学与移民文学…… 苑缘
摇第五节摇鲁迅的《故事新编》和他的后期杂文 …… 苑员
摇第六节摇夏衍、田汉与“上海屋檐下”的戏剧创作 …… 苑愿
摇第七节摇普罗电影文学 …… 苑缘
第十八章摇文化产业的发展与上海现代文学的新气象 …… 苑苑
摇第一节摇电影与电影文学 …… 苑苑
摇第二节摇《申报·自由谈》的改组与转向 …… 苑远
摇第三节摇副刊连载与小说的通俗化 …… 苑怨
摇第四节摇《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策划与出版 …… 苑源
第十九章摇中流作家的创作 …… 苑怨
摇第一节摇巴金与他的“激流”系列 …… 苑园
摇第二节摇曹禺的创作与上海 …… 苑缘
摇第三节摇沈从文:现代都市中的游离…… 苑苑
摇第四节摇靳以与浪漫文学创作 …… 苑园
第二十章摇“现代派”文学 …… 苑缘
摇第一节摇现代上海崛起的“现代派” …… 苑源
摇第二节摇施蛰存的心理主义文学 …… 苑愿

摇第三节摇刘呐鸥、穆时英与新感觉主义…… 愿员
摇第四节摇戴望舒的诗歌与“现代情绪”、“现代诗型” …… 愿员
第二十一章摇京海之争与海派文学 …… 愿愿
摇第一节摇京海之争与海派文学概念的显现 …… 愿愿
摇第二节摇都市的厌腻与沉溺 …… 愿圆原
摇第三节摇都市媚俗的文学趣味 …… 愿圆愿
第二十二章摇市民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 愿猿员
摇第一节摇通俗文学的新变 …… 愿猿员
摇第二节摇张恨水与国难小说 …… 愿猿远
第二十三章摇中国救亡文学的前哨 …… 愿源圆
摇第一节摇民族危亡中的上海,中华民族文化的息壤…… 愿源圆
摇第二节摇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 …… 愿源远
摇第三节摇救亡戏剧与抗战戏剧 …… 愿缘园
第二十四章摇孤岛文学 …… 愿缘源
摇第一节摇孤岛文学及其内部论争 …… 愿缘缘
摇第二节摇苏青、谭正璧 被遗忘了的缪斯 …… 愿远员
摇第三节摇柯灵、唐弢等人的文学活动…… 愿远苑
摇第四节摇上海在全国现代文学中心地位的丧失 …… 愿怨
第二十五章摇生活的反讽 …… 愿圆
摇第一节摇张爱玲的开拓 …… 愿圆
摇第二节摇钱锺书的“突围” …… 愿苑
摇第三节摇师陀 处身于故乡与上海的焦土之间…… 愿愿园
第二十六章摇战后心灵的呼吸 …… 愿愿猿
摇第一节摇哲学化的思索与寻觅 …… 愿愿猿
摇第二节摇“九叶”诗歌 …… 愿愿苑
摇第三节摇新兴的浪漫与写实 …… 愿缘
第二十七章摇黑暗时代的文学 …… 怨园
摇第一节摇巴金:“寒夜”里的创作 …… 怨员
摇第二节摇《马凡陀的山歌》与《五子登科》、《升官图》等 …… 怨苑

第四编摇上海当代文学史

第二十八章摇建国初期的主流文学 …… 怨猿
摇第一节摇文学的基本语境 在工农兵方向的指引下…… 怨源
摇第二节摇历次文化批判与“大写十三年”的导向 …… 怨愿
摇第三节摇吴强、峻青、茹志鹃的革命战争文学创作 …… 怨园
摇第四节摇周而复、艾明之、胡万春反映上海变革的创作 …… 怨苑
摇第五节摇夏衍、杜宣的电影、话剧创作 …… 怨愿
摇第六节摇与社会潮流合拍的诗歌、散文创作…… 怨苑
摇第七节摇“文化大革命”与上海文学的沉沦 …… 怨远
第二十九章摇“五四”文学精神的潜行 …… 怨缘
摇第一节摇胡风、钱谷融、蒋孔阳的理论建树 …… 怨远
摇第二节摇巴金十七年间的散文创作 …… 怨员
摇第三节摇傅雷真诚的个人话语空间…… 员园员
摇第四节摇儿童文学创作的独树一帜…… 员园怨
第三十章摇新的时代开了上海文学的新生面…… 员园苑
摇第一节摇思想解放与文学复兴…… 员园苑
摇第二节摇文学观念的更新与上海发起的三次大讨论…… 员园源
摇第三节摇关注现实人生的文学主潮…… 员园苑
摇第四节摇新视野,新特色 …… 员园员
第三十一章摇在艰难求索中开拓创新的上海作家、作品 …… 员园员
摇第一节摇在求索中恪守本位的小说创作(一) …… 员园源
摇第二节摇在求索中恪守本位的小说创作(二) …… 员员远
摇第三节摇散文与纪实文学的新开拓…… 员员员
摇第四节摇诗歌的艰难求索…… 员员怨
摇第五节摇戏剧影视文学的再兴与网络文学的初现…… 员员怨
后记…… 员员园

第三编摇上海现代文学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导摇摇语

如果说文学的近代化是使得文学从乡野转向都市，从绅士阶级的读者转向市民读者的过程，那么，就空间意义上而言，作为文学近代化积极成果的中国现代文学，则是以现代都市生活为基础，以现代都市文化为主导价值内涵的新文学。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最初发祥地和基本生息地乃在中国最重要的大都市——上海。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至少在其产生和发展的初始阶段，自然地以上海为中心。

当人们在与“传统”的联系中言之凿凿地论辩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素质到底是否有或者有哪些时，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基础是什么，也即很少有人关注它所具有的现代市民文学的基质。郁达夫对文学的现代性有过十分明了而且也堪称精彩的表述，认为文学的现代性便是将表现的重点和言说的对象由少数人移动至稠人广众之中。这里的稠人广众毫无疑问描述的乃是现代都市风景。以都市社会里的稠人广众为基本对象，必须借助于传播媒介，而中国的传播媒介自 19世纪后半叶起便以上海为最发达，特别是那些直接面对广大读者的文化艺术传播载体。开埠以来率先进入近代化的上海拥有最为庞大也最为典型的近代市民社会，上海之于全国经济的领先地位，决定了处在商业化、市民化运行模式中的现代中国文学在这里找到了最适合的孳生地。在这样的市民社会里往往能迅捷地培养起近代文化消费的文明习惯，而这样的习惯便有效地培育和刺激起近代的文化市场，而文化市场的形成又往往能吸引大批文人的集聚。这些文人在这样的都市里得其所哉，他们既能从这个市民化的社会里领略新的生活，又能发现新的社会问题，启发新

的人生思考，从而表现出新的人文诉求。因此，近代以来，上海市民社会的形成、壮大与中国市民文化的发达，直接造成了市民社会的文化消费市场在上海的形成，这使得上海成为全国的出版中心。日趋健全的现代出版和发行机制使得现代文学和文化的传播模式在上海成型并趋于成熟。这便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基础。显然，拥有这样典型的现代文学基础设施和新的运行机制，是上海作为全国现代文学中心的决定性因素。

上海是中国市民社会最发达的地区，因而也是近代以来市民文学发展最充分的地方。中国市民文学的主要创作基地、主要创作队伍和主要消费市场可以说都在上海。由于上海处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前沿，以上海为依托的市民文学也便相应地处在现代化的运作之中。朱瘦菊等人在 圆园世纪 圆园年代就开始改良鸳蝴派小说的套式，融入了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新文化内涵。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等将新道德新思想引入通俗化的男欢女爱和悲欢离合中，成为新时代市民文学的中兴之将。源园年代的通俗文学通过相应的杂志表现出了动荡不安的社会的“春秋万象”。当然，总体来说，市民文学的基本格局是保守的，跟不上新文学的前进步伐，即使到了 源园年代，其现代化程度依然不高。

上海特殊的政治地位也是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集散地的原因之一。自近代以来，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口岸，一直是中国通向世界的最前沿的窗口，上海拥有当时最大的租界地域，众所周知的租界条件对于中国各个时期的黑暗专制政治客观上起着缓释、消解作用，这使得文人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在上海也能获得某种回旋的余地。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政治空间概念的上海又绝非那种天高皇帝远的边缘城市，它不仅在经济和社会上有着辐射全国、影响内地的中心位势，而且靠近当时的政治中心南京，事实上南京的达官显贵、绅董巨贾无不在上海建立自己的立足之地或者将自己的势力触角伸向上海。加之上海的新闻传播条件，某种意义上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上海似乎比南京更具有政治涡流中心的性质。

上海在政治空间意义上优越于南京的一个关键之点，尤其对文化人和现代文学家而言，是它不像国民党政府首都那样有着严整的政治控

制。在三教九流横行、东南西北杂陈、泥土沙砾混合、天龙地蛇争滩的上海，国民党政府那一套政治控制机制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导致各种政治势力和文化势力有可能借此与南京政治力量作周旋乃至抗衡，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派力量实际上都将上海当作政治、文化的缓冲地带。这样的空间条件客观上适合现代文学的生长发育。

上海作为中国最现代化的大都市，同样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源。上海作为富饶美丽的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其周边地区的现代经济形态也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源。上海的民族工业和买办工业在全国现代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仅使得《子夜》这样的巨著只能产生于上海，而且，有关表现工人阶级生活的文学作品也自然地集中在这一带取材。普罗文学的大部分作品以上海为场景绝不是偶然的。上海周边地区的农村又为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留下了正待抹去的面影，圆园世纪 猿园年代以后大量的农村乡土题材作品大多以上海辐射区为中心，这也是一种有意味的历史。

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是从文化中心南移上海开始的，此后一直以上海为中心得到发展与繁荣，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改变了上海作为现代中国文学中心地位的状况。随着上海退出了文学中心的地位，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便也在现代化的意义上面临着某种凝滞（虽然，在延安，现代文学在革命化的意义上正向纵深发展和推进）。抗战胜利之后，国共战争的间隙之中，上海文学一度产生了某种复苏的迹象，包括《文艺复兴》、《诗创造》等杂志的创办，钱锺书、张爱玲、无名氏等作家的活跃，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的起点上复兴的征兆。但当政治话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之后，本不是政治中心的上海，其文学自然彻底退出了文学中心的地位。

上海是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发展悲壮剧的中心舞台，而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运作中的许多喜剧、闹剧倒是远离了上海，至少不是以上海为中心。这足以使上海骄傲。

文化的上海，文学的上海，是现代中国的幸运，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幸运。

第十二章摇全国文学中心的南移与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地位的确立

从运作机制和阅读主体方面而言，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硬件”标志，一是近代都市和近代市民文化消费市场的形成，二是与此相联系的近代市民文学异乎寻常的繁盛，三是将文学事业与新型的印刷、出版和发行业密切联系起来的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达。这样的“硬件”在上海最为齐备，发展也最快，而到现代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于是，由近代到现代，上海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文学的中心。现代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刚开始时是在北京，但新文化的运作成果大多要转移到上海才似乎能够发挥其最大的效用，于是中国文学的中心自近代以来有过数次的南移。解开这其中之谜的要诀，便是近代以来文学和文化产业化、市场化性质所使然。产业化需要相应的工业基础，市场化需要相当的市场孕育，这些方面只有上海能够为现代文学提供最优良的条件。

第一节摇上海市民文学基地的形成及摇摇摇对于现代文学基地的召唤

摇摇经过“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等虽然实效甚微但毕竟轰轰烈烈的文学运作，中国传统文学巍巍巨厦的根基已经严重地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摇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基本背景的近代文学,到了清末民初,只剩下三股主要力量。一是作为前述“革命”成果的新文体及政治化的创作,这股力量随着梁启超等人的退隐文坛即迅速消湮,但其所开辟的传统则影响了五四新文化的一代先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新传统中极富冲击力的一脉。二是抱守着传统文学的趣味不放,在陈词滥调中作拟古和泥古式的酬唱,这样的文学自然是现代文学所批判和摒弃的对象。三是通俗文学,它在白话语言上为现代文学作了有效的开拓和铺垫,并为现代文学培养了读者市场。

最初开启上海都市文学的形成过程,显示中国文学新旧嬗变轨迹的,毫无疑问是通俗文学的发展。上海自从变为“洋场”之后,文化产业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发达,而具有市场活力的文学当然是通俗性强的作品,于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中心一直在上海。上海的通俗文学最直接的源头应当首推清末兴办的登载言情小说和各种谐文、花史、野史、梨园志、俳优传等类的游戏文章,旨在供人消闲的报刊。表面看来这些不登正统文学大雅之堂的小玩意似乎微不足道,它们中有的也的确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但它们在斯时斯地突然备受青睐却又是意味深长的。这与近代上海作为一个商业化大都市的崛起、市民阶层成为一个潜在而巨大的文化消费对象密切相关。文学作为文化产业投入到市场运作,这对于绵延几千年的中国文学来说的确是一个发展和突破的紧要关口。

经济的繁荣使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商业城市,从而带来了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尤其是对新型劳动力的需求,这使得新式教育得以推广。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也为上海的这个近代都市提供了一个职员阶层,他们有老板、会计师、经理、总办、办事员、秘书、译员、工程师、医师、药剂师、教师、编辑等,这些在一二十年代的上海都是很体面的职业,而且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他们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由工人、职员所组成的群体构成了上海市民的主体部分。他们需要信息、需要知识、需要思想、需要消闲娱乐,而所有这些东西的主要来源是近代报刊。清末民初上海市民文学、鸳鸯蝴蝶派等文学的兴起是我国



30 年代的上海外滩

文学走向市场、文学向商品化认同的表现。以后的文学发展充分地显示出近代报刊对中国文学的转型起着怎样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上海的近代文化发展中，市民的需要日益起着决定性作用。到民国初年，大部分报刊和出版物都已经市民化了。时代对文学的选择有多种方式，但不外乎两种：一是外部的总体干预，它一般能决定文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内部的变革，它往往能决定文学建构的文化特质与发展形态。外部的干预主要表现为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心态对文学整体的强力控制，即当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活方式发生变动之际，相应变化了的社会审美需要和文化消费观念对文学发展方向便给予强大的影响。就上海文学在近代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士大夫文化逐步削弱，市民文化方兴未艾，最早进入市民阅读视野的是报刊和平装书，文章的作者虽仍然是文人，但他们与传统意义上的文人有了区别——他们大多数是官场失意的文人，他们在为市民写作时头脑中的士大夫意识逐步淡化。由于办报需要向外文报刊和外国人办的中外报刊学习，所以他们的思想意识也不断受到西方影响。因而报刊逐渐成为代表市民思想、适合市民读者阅读需要的一种载体，被广大都市市民所喜闻乐见。

资本化的文学运行机制给文学的传播带来革命性的推进，形成一个

广大的市民读者层，也促使新型作者的出现，即让一部分文人从“文以载道”的传统中脱逸出来，成为以文为生的现代意义上的职业作家。他们与受过新式学校教育的新型知识者一起构成二十世纪初期最早的一批初具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一系列外部因素的变化与文学内部的起决定意义的文化特质与发展形态的变异之诸种表现交相辉映，最终导致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

第二节摇新文化力量在上海的汇集

毫无疑问，上海作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中心，领导了当时中国文学的发展。当时，全国的近代文学期刊和以文学为主的期刊中，上海出版的占了大多数。近代报纸开辟文艺副刊也是在上海首创，《申报》副刊《自由谈》、《新闻报》副刊《快活林》、《时报》副刊《余兴》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大报文艺副刊，影响颇大。“报章体”文章改变了传统古文的形态，它是在上海首先兴盛起来的，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传教士的文章。梁启超提出变革小说的思想最早是发表在上海的《时务报》上，他后来提出小说界革命，在日本创办《新小说》，而《新小说》的发行却一直在上海，第二年编辑部也转到上海。近代文学的商品化最初也是在上海盛行起来，然后由上海推向全国，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作者、读者、文本、语言、文学体裁的运作模态。正是这些促使当时的上海引导了中国文学发展的趋势，所以使它实际上成为当时中国的文学中心。

按照一般规律，一个国家的文化中心与它的政治中心往往是重合在一起的，但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却有一些独特。上海和北京作为中国的两个大都市，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其潜在的发展前途上看都是其他城市所无法企及的，作为文化中心的上海与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关系微妙而复杂。它们之间的关系较之天津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就显然不同。天津往往被作为北京的南大门而倍受重视，它无法在文化上政治上与它的大本营北京独立开来，更没有力量与北京形成对峙的局面。而上海则不然。上海的经济发展明显快于北京，文化生态环境也优于北京，加之因地

理位置上的隔阂在近代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错层，给这两座城市其后的关系定下了变幻莫测的基调。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人士总是希望将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重合在一起并作着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他们从倡导新思想、新文化入手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具体说来就是他们大多在上海先酝酿其文学理想，以此为基础酝酿其政治理想，而政治理想就必须到北京去实现。我们从世纪之初的那些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人士南北穿梭的忙碌身影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几乎所有的新文化运动的早期领导者们都与上海有过这样那样的关联。他们大多是由上海培养出来的。蔡元培在上海办教育，办报刊；陈独秀在上海办过《国民日日报》；胡适是在上海读的中学，并且在中国公学主编过《竞业旬报》；周作人最早的译作与创作《孤儿记》都是在上海出版的；鲁迅在近代与上海的关系较少，但他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怀旧》是在上海的《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刘半农则完全是由上海培养出来的作家，他早期的文学活动是在上海进行的，大量的作品都发表在上海。上海是他们最早的出发点和集训地，他们等待着机遇的来临去那个政治中心一展雄心壮志。然而北方的那片天空下也充满了崎岖坎坷，刹那的辉煌之后是难耐的孤寂，注定了他们还要再退回上海来重新聚集力量为再一次出击做好准备。



《新青年》书影

如果要想看清楚那些活动在新文学草创期的先驱者的面影，最好先来考察一份刊物。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恐怕没有一份可以超越《新青年》独特地位的刊物。1935年在重印《新青年》杂志时，胡适曾有这样的题词："《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是陈独秀，它是由一家名为"亚东图书馆"的出版发行机构发行的。



陈独秀像



胡摇适摇像

“亚东图书馆”的前身是“科学图书社”,由陈独秀和同乡汪孟邹在芜湖共同创立,后陈独秀因政治失意到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汪孟邹将“科学图书社”迁到上海扩大为“亚东图书馆”。汪孟邹是陈独秀的同学、好友汪希颜的胞弟,他们与胡适都是安徽人。最初他们因同乡而发生关联,随着《青年杂志》在上海的发展壮大,其作者圈也打破了同乡的界限,被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所关注,陈独秀为了使该刊更具吸引力,于员月将停刊半年的《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更名后的杂志作者队伍壮大了,李大钊、吴稚晖、刘半农、马君武、苏曼殊、杨昌济、吴虞等一大批令今人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是在那时崭露头角的。员月《新青年》(圆卷 缘号)刊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紧接着圆月《新青年》(圆卷 远号)又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从而使二人暴得大名。他们“文学革命”的主张很快得到了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的响应,纷纷在《新青年》上发表自己文学革命的主张,从而树立了一座中国文学的里程碑,拉开了新文学的序幕。至此,这份杂志的作者由同乡而同人而同志,逐渐壮大为一家为广大进步青年所青睐的刊物,影响也由上海辐射至全国。

年的北京由于袁世凯去世,黎元洪继任总统,北洋军阀的政治

控制大大缓和，蔡元培被邀任北京大学校长并立志改造北京大学，他极力劝说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陈独秀北上后，《新青年》也被带到北京。员怨员缘年 猿–愿月，新的作者有蔡元培、章士钊、恽代英、毛泽东、刘延陵、俞颂华等。

“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初由北京发起，但上海一直是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的城市。上海的《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是支持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报纸。当北京新旧思潮激烈交锋、林纾等人站出来攻击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时，《民国日报》抨击北京“政府之人物，无一非专制头脑”，《时事新报》鼓励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凡欲革新一代思想学术，终不免有忤逆世俗之虞。来日方长，挫折正未有艾。寄语以革新事业为己任者勿以区区恫吓而遂气沮也”。《神州日报》则要求广大读者认清形势，“我希望我国青年的脑筋，不要被那般旧派的人迷惑住”，这些有力的支持帮助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前发展。

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出版基地，上海不仅给“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以坚决的支持，而且利用自己的力量和地理优势为新文化出版了不少集成性的成果。员怨员缘年 猿月后的《新青年》编辑部虽然在北京，但是出版发行却由上海的群益书社负责。陈独秀把北京大学的文科出版物交给上海的亚东图书馆出版，该馆出版了《胡适文存》、《独秀文存》、《孟和文存》、《吴虞文存》等新文学家的文集，这个出版社后来还出版了汪静之的新诗集《蕙的风》、俞平伯的《冬夜》、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短裤党》等新文学作品。上海的泰东图书局在 员怨员怨年成立编辑部以后，就改出新文学书刊，成为创造社的出版基地。相比之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文学作品要稍晚一些。但由于商务印书馆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和雄厚实力，它一旦支持新文学，其力量远非其他出版社可比。员怨圆员年商务印书馆开始革新《小说月报》，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刊载新文学。员怨圆员年 员员月，张元济和高梦旦到北京，与郑振铎达成协议，《小说月报》改为新文学刊物，由沈雁冰主编，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

在 圆园年代的中国，虽然由于新北大的崛起，文化中心由上海移向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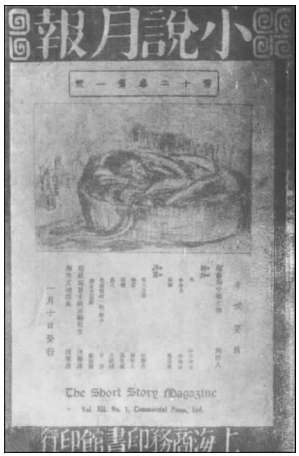
京,与政治中心重合,但由于政治中心的北京是由作为守旧势力的代表北洋军阀来统治的,而文化中心则是由反传统的新文化来领导,新旧势力之间必然产生严重的冲突,于是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就呈现对立状态,政治势力也就必然要迫害新文化运动,用各种方式来压制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官方对北大新文化运动的压力一直存在,“五四”之前陈独秀已被迫离开了文科学长的位置。林纾抨击新文学时也呼吁官方给予新文学家以更大的压力。新文学家们已经感到这种巨大的压力难以承受。不仅是陈独秀在被捕释放后毅然南下上海,将《新青年》又带回到上海来办,就连胡适、傅斯年、罗家伦也在“五四”之前就提出“把北大迁到上海租界去,不受政府控制”①。到 员怨圆远年奉系军阀进京后,这种政治迫害又进一步发展为屠杀,他们以“赤化通敌”的罪名先后捕杀了著名报人邵飘萍和林白水,并且逮捕了《世界日报》的老板成舍我,迫使激进的新文学家们纷纷南下,于是文学中心又回到上海,并造成了 圆园年代后半期和 猿园年代上海文学的高度繁荣。

第三节摇《小说月报》及其改版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一开始是在北京,上海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镇只能充任配角,以自己的报刊为新文化运动喝彩,以自己的出版为新文化运动造势,那么,当中国现代文学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建设时期,也即当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开始运作、《小说月报》实施改版的时候,情况便发生了很大变化,上海作为新文学中心的地位可以说得到了初步确定。

《小说月报》是我国较早的大型刊物,创刊于 员怨员员年 苑月。“五四”运动前该刊为“鸳鸯蝴蝶派”的阵地,最初由恽铁樵主编,后由王蕴章(西神)主编。该刊是商务印书馆下属的一家刊物。商务印书馆是几个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于 员怨园远年 源月创办的一家印书馆,它与当时那些承袭江南书籍文化的文人书馆不同,其创立标志着一个原本

① 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



《小说月报》刊影

与藏书、购书无缘的社会群体进入了印刷业。这使印刷文化的社会结构、技术基础、经济特征和读者面都发生了改变。实际上，衡量印刷文化变化标准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读者群的变化。早期商务印书馆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家成功的非官方出版机构，而且在于它开辟了一个新的、以都市普通人为阅读主体的书籍生产空间。这个新的读者群的敏感和想象力使早期商务印书馆区别于其他上海私立书局①。由于几个创办人出身下层，所以他们在近代上海书业印刷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为了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他们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技术和文化资源，把印刷业转为出版社，并且不断创造新读者，开拓新市场，将书籍的拟想读者群超出于文人和商人的圈子，推向更为广大的普通人。商务印书馆的阅读主体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实用性、职业化、普通人的读者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商务印书馆的发起人是现代都市读者群的最早的发掘者、培育者。《小说月报》在“五四”运动前后的革新也正是这种出版方针的反映。

《小说月报》创刊伊始，正是黑幕小说、言情小说盛行时期，因而它自然就成为一块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阵地，又因适应了当时市民读者的需要，逐渐发展成为一家颇具影响的文学期刊。它在“五四”时期遭到进步文化界的批评，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时代在不断前进，如果编辑者的思想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必然跟不上新形势的发展，使对新事物很敏感的青年读者感到不满，甚至对其陈腐的面貌产生反感。“五四”时期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就曾撰文对此刊进行过尖锐的批评。北京大学是全国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商务印书馆当然不会

① 孟悦《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与上海近代印刷文化的社会构成》，见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illegible]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